

承前啓後之西明藏： 西明寺的藏經的組成及儲存方式*

湛如
北京大學

摘要：西明寺是高宗朝以降唐代佛教典籍重要的生成與收藏地點，因此此寺的藏經就對研究唐代佛教具有重要意義。此文即主要研究了西明藏的內在形式特點，認為其中包括正藏與雜藏：正藏以傳統譯經為主，而雜藏則兼採中土僧史等各類著述，這就為此後各類大藏經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除此之外，就外在形制而言，西明藏的儲藏有專門的經臺和經櫥，前者用於宗教供奉，後者用於僧人的日常閱讀。分工明確，各司其職。西明藏還與武則天家族存有不為人所知的聯繫，通過碑刻材料可以發現，武則天之母楊氏與西明道宣法緣甚契，而楊氏去世後為其追福的寫本一切經也被充入了西明藏之中。這不僅為西明寺與武周政權間的關係提供了佐證，也讓我們更為瞭解唐代寫本一切經的產生、功用以及與政治之間的緊密紐帶。西明藏也隨著僧人的流動而被帶到他方，其中雜藏中的內容，尤其是僧史等傳播力度不大，但唯識部分則有廣泛流傳。

關鍵詞：西明藏、形制特點、武周、政教關係、對外傳播

1. 問題所在

西明寺是唐代的譯經中心，玄奘等人在此翻譯佛經，為西明寺留下大量的典籍，高宗顯慶年間詔令西明寺寫經一部，號稱“一切經”。據靜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中說“顯慶年際，西明寺成御造藏經，更令隱煉，區格盡爾，無所間然。律師道宣又為錄序。”¹ 隨著時間流逝，這部藏經消失在歷史中，無法得窺其全貌，本文以這部藏經為基點，試圖從經典翻譯與流傳角度，對當時西明寺在絲綢古道上所起的作用進行一些簡單的論述。

對唐代藏經的研究，首推 2006 年方廣錫的《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該書對八到十世紀大藏經的形成、結構、分布做了詳細的研究。² 2009 年吳福秀《〈法苑珠林〉分類思想研究》，梳理出《法苑珠林》所徵引的大量文獻。³ 對於藏經的儲存，2000 年，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考古發現》一文提及經臺所在，⁴ 2011 年森下和貴子發表《作為一切經和六宗的經藏櫥子及其形狀》一文，考察藏經儲存的櫥櫃形狀。⁵ 2013 年張春雷《“經臺”辨考》指出“經臺”是寺院儲存藏經的重要場所。⁶ 這些研究，為本文能進一步研究西明

* 本文為 2018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印度古典梵語文藝學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18ZDA286) 階段性成果。

¹ (隋)法經撰《眾經目錄》卷 1：“顯慶年際西明寺成御造藏經”，《大正藏》第 2146 號，第 55 冊，第 181 頁。

²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³ 吳福秀《〈法苑珠林〉分類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

⁴ 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考古發現》，《唐研究》第 6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337-352 頁。

⁵ (日)森下和貴子《一切經の經藏厨子としての六宗厨子とその形状》，《南都仏教》，第 96 卷，2011 年，第 43-45 頁。

⁶ 張春雷《經臺辨考》，《佛學研究》2013 年 03 期，第 102-105 頁。

藏奠定了重要基礎。本文擬從下面三個角度探討西明藏。

第一、西明藏的主要組成有正藏和雜藏。雜藏收集了僧史等中土著書，為後來的藏經組成提供了基本的架構；

第二、西明藏的儲藏有專門的經臺和經櫥；

第三、西明藏與武則天家族；

第四、以經錄為基礎，探討西明藏的流傳情形。

西明藏隨西明寺的消亡而散佚，眾多的細節因為材料的缺乏無法進行深入探討。儘管如此，對於這一部藏經編撰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藏經，仍有許多值得挖掘的地方，本文通過零散的資料還原其大致組成與儲藏場所，以冀能將西明藏的部分面貌呈現出來。

2. 搜古納今成雜藏

西明藏的原貌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祇能借助一些零星的記載管中窺豹。這部藏經的主要組成部分有正藏和雜藏。正藏兼收以往和新翻的經典；雜藏也在不斷收錄編輯。

西明藏的總數，有兩份材料可以參考。首先是《大唐內典錄》卷十載：“唐京師西明寺，所寫王翻經律論集傳等（顯慶三年），入藏正錄，合七百九十九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五萬六千一百七十五紙。”⁷道宣祇錄了正藏，說存有經文 3361 卷，《西明寺錄》已經散佚，不能得知西明藏內容。但對其細節之考證仍可得其珠絲馬跡。據湯用彤先生考證：

⁷（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10，《大正藏》第 2149 號，第 55 冊，第 337 頁。

《京師西明寺錄》，三卷。⁸

《大唐內典錄》，十卷。

上兩錄均釋道宣撰。按《靜泰錄序》曰：“顯慶四年，西明寺奉敕寫經，具錄入目”，又曰：“顯慶年際，西明寺成御造經藏，律師道宣又為錄序”。則道宣實撰有《西明寺錄》。又《內典錄》卷十於“隋仁壽年內典錄”下，言及西明寺所寫正錄云云。故圓照《續開元錄》著錄有“《京師西明寺錄》三卷”。據《內典錄》卷五《玄奘傳》，謂“始自弘福，今迄北宮一十八載”，及卷九“大唐衆經錄”條，《內典錄》在龍朔二年已開始撰集。又據跋尾，則謂龍朔四年（即麟德元年）訖。故《開元錄》謂“《大唐內典錄》，十卷，麟德元年甲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又據《靜泰錄》所述《西明錄》內容，則《內典錄》或由《西明錄》改造而成也。⁹

湯用彤以及方廣錫先生都大致同意《西明寺錄》乃是顯慶年間西明寺初成之際御造寫本一切經的目錄，並且《大唐內典錄》的入藏錄，乃是道宣據《西明寺錄》改製而成。¹⁰ 這套皇家藏經的結構，據靜泰（活躍於七世紀中葉）的《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載：

顯慶（656–661）年際，西明寺成，御造藏經，更令隱

⁸ 關於《西明寺錄》之卷數，方廣錫先生據《法苑珠林》卷一百中《西明寺錄》為一卷之記載，認為“道世與道宣同時，均居於西明寺，所記當可信從。《內典錄人藏錄》載有“《入藏目錄》，一卷”（《大正藏》第2156號，第55冊，第312頁下）。所指應是該《西明寺錄》。故湯先生據圓照《續開元錄》稱該錄為三卷，恐有誤。”詳參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58頁註1。然詳之圓照《續開元錄》卷二與卷三之中（《大正藏》第2156號，第55冊，第764–765頁；第769頁），其記載甚詳，指明此錄存三卷，並請求入藏。故我們至少不能排除此錄有不同的卷帙分合情況的存在。

⁹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頁。另參可參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58頁。

¹⁰ 參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58–59頁。

鍊，區格盡爾，無所間然，律師道宣又為錄序。殷因夏禮，無革前修。於三例（指單譯、重翻與梵集）外，附中雜藏（詳後）。即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是也。頗以毘贊有功。故載之云爾。¹¹

此處較可注意者為西明寺藏經之分類曾有過重大的革新，此點具體詳後。另外亦可注意者，西明寺藏經乃是皇家御造，在此後的部分我們還會提到武則天之母在去世後修福所造之一切經也同樣納入了西明寺藏經之中。故這種皇室大力資助的一切經，就不但為其藏經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資助，也使西明寺藏從一開始之時，就因皇室的背書而天然具有權威性。

其次是慧琳的《慧琳音義》在西明寺撰寫完成，極可能依據西明藏目錄編纂，詮釋的一千三百部佛經大致上反映了中唐時入藏佛經的概貌。¹² 慧琳所錄遠超道宣所錄，是因西明藏的編修並非一時之功，如在貞元十四年（798）圓照就“書寫此新譯經，填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本”，¹³ 西明寺僧人在不斷的收錄新譯經典，令西明藏的佛經部分越來越龐大。

對於雜藏部分，靜泰《眾經目錄》卷一中前引說：“於三例外，附中雜藏。即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是也，頗以毘贊有功，故載之云爾。”¹⁴ 在傳統的經律論外，又增加了中國編撰的種種著作。以道世在編撰《法苑珠林》時所記，中土著作應有 3000 多卷，他當時

¹¹ 《大正藏》第 2148 號，第 55 冊，第 181 頁。

¹²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 295 頁。

¹³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藏》第 293 號，第 10 冊，第 849 頁。

¹⁴ （隋）法經撰《眾經目錄》卷 1，《大正藏》第 2146 號，第 55 冊，第 181 頁。

尚能在長安找到千卷，¹⁵ 這千卷，想必大部分都是雜藏中的內容。對於道宣不收錄雜藏內容，方廣錫認為雜藏是高宗要求，佛教傳統不錄，所以道宣不提及此事，¹⁶ 到了靜泰修藏經之時就有“請祛雜藏”的要求。¹⁷ 此種說法值得討論，西明藏之前，已有別藏的傳統，並非自西明藏始創，¹⁸ 雜藏的編修若是遭到傳統僧人抵抗，當時玄奘為何不提出異議？玄奘早在慈恩寺之時，以原有的藏經進行講習，《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¹⁹ 玄奘曾為此上表謝恩。至顯慶年間在西明寺造藏之時，玄奘若對雜藏不滿，可以上表抗議，但在《玄奘傳》中，並未提及此事。可見玄奘默認雜藏的組成，並且藏經的編撰與收集，並非隨著玄奘的圓寂而結束。《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中提及乾封年間（666–668），道宣與天人感應之事也存於西明寺藏。²⁰ 顯慶到乾封，中間經歷十餘年，還有人繼續將中土著述編入雜藏當中，應是僧人在自願編修西明寺藏。此事祇能反映當時入藏的標準不統一。因此，西明雜藏部分，道宣未曾入藏，直

¹⁵（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00：“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帙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減向千卷”（《大正藏》第2122號，第53冊，第1020頁）。

¹⁶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110–111頁。

¹⁷（隋）法經撰《眾經目錄》卷1：“三章久布，畫一承風，明誠古人，請祛雜藏”（《大正藏》第2146號，第55冊，第181頁）。

¹⁸（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00：“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網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大正藏》第2122號，第53冊，第1020頁）。

¹⁹（唐）慧立、彥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大正藏》第2053號，第50冊，第260頁）。

²⁰（唐）慧立、彥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0：“宣因錄入著記數卷，見在西明寺藏矣”（《大正藏》第2053號，第50冊，第277頁）。

接分散到《大唐內典錄》中，如卷九中收西明寺真懿律師《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並為之序。²¹

雜藏由法苑法集、高僧僧史構成。法苑法集是指中土僧人著述。高僧僧史指中土僧人歷史，二者具體組成難以了知，但可從後期的著作中窺見一二。道世的《法苑珠林》在西明寺寫成，其中所引用的文獻應是西明寺原有藏書。據吳福秀《〈法苑珠林〉分類思想研究》統計過《法苑珠林》所引用的外典，²² 分析其中佛教部分，可分為三大類：首先是寺志類，如《洛陽伽藍記》《梁京寺記》等；其次是僧人傳記類，如慧皎、道宣所著的僧傳等；最後是感應事跡類，如道宣的《三寶感通錄》等。這些典籍證明靜泰所記不虛，高僧僧史的確被列入雜藏當中。除了僧史之類，西明寺中還有大量藏書。《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卷一中說：“右雜書等，雖非法門，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從六月迄於十月，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²³ 這些雜書雖未能入藏，卻體現當時西明寺藏書之多，且不局限於佛教。

西明寺藏的雜藏組成結構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革命。將中土著述引入到藏經中，這種方式在之前雖出現過，如隋代智果編撰的官藏中就有中土著述的存在，²⁴ 但是後繼無人。西明雜藏在剛出現的一段時期內也並未造成太大影響。《大唐內典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的賢

²¹ (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9：“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大正藏》第2149號，第55冊，第312頁)。

²² 吳福秀《〈法苑珠林〉分類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第215-222頁。

²³ (日)宗叡撰《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卷1，《大正藏》第2174A號，第55冊，第1111頁。

²⁴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6頁。

聖集當中，所收還是印度的著述，至《開元釋教錄》沿襲西明藏結構，卷二十賢聖集開始收錄中土撰述²⁵。《貞元釋教錄》在《開元釋教錄》中土撰述的基礎上有所增加。《開元錄》作者智昇，暫無資料顯示其與西明寺有關；《貞元錄》作者圓照則是西明寺沙門。此後收錄中土著作入藏，所收多少不一。到宋代大中祥符五年（1012）編撰《大中祥符法寶錄》時，由僧人施護、惟淨等人上書，將中土著述入藏一事成為定式，形成東土賢聖集：

自余名臣開士所述，起貞元之後，迄於聖朝。或討尋經論之微言，或紀錄龍象之大行，或吟詠法性，或演暢宗風，今並採當世之高奇，因前錄之次，序附二聖之作，以為東土聖賢集，亦猶軻雄談道，俱為闕里之徒，公谷授經並列春秋之學，期永傳於後代，庶有補於將來云爾。²⁶

這一次所收錄的內容，明顯偏向禪宗語錄，這與惟淨自身的身份有關。《佛祖統紀》中說他是李煜之侄；²⁷ 李煜奉法眼宗文益禪師為師，²⁸ 所以惟淨偏重禪宗語錄不足為奇。儘管如此，其綱目仍不離西明雜藏。由此可知，雖西明雜藏湮沒於歷史，但因西明寺高僧彙聚，隨著數代人的努力，雜藏變為中土藏經的一部分。

²⁵（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20，《大正藏》第2156號，第55冊，第720頁。

²⁶（宋）楊億等編修《大中祥符法寶錄》卷18，《趙城金藏》第1493號，第112冊，第101-102頁。

²⁷（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43：“惟淨者，江南李煜之侄”（《大正藏》第2035號，第49冊，第398頁）。

²⁸（明）心泰編《佛法金湯編》卷10：“嘗請文益禪師住報恩禪院”（《卍續藏》第1628號，第87冊，第413頁）。

3. 高閣樓臺供經卷

數千卷的藏經需要佔據大量的空間，因此西明寺藏的儲藏是本文另外一個關注要點。唐代的經本以手寫而成，一紙二十五行，一行十七字；²⁹ 寫完卷軸裝裱，一軸即稱一卷。佛教藏經眾多，西明藏佛經就有 3361 卷，此外還有雜藏及雜書內容，如此之多的典籍，西明寺如何分類儲存？《三藏法師傳》卷十中說西明寺“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如此之多的建築，藏經放置於何處？這是研究西明藏必須面對的兩個問題。

今人張春雷在《“經臺”辨考》一文中，指出經臺即經樓，用於貯存藏經。³⁰ 安家瑤曾對西明寺和日本的大安寺進行對比，指出西明寺經臺位於中殿堂左或右的延伸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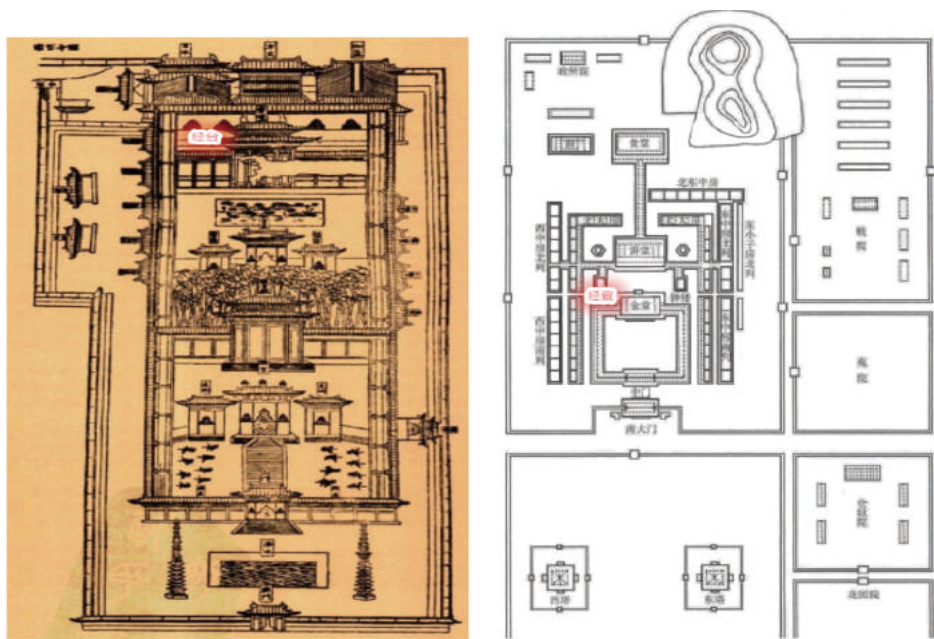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發掘中最令我們百思不得一解的是中殿左右兩側南伸的部分現在的中國古建築中沒有這種形制。奈良寺院金堂之北講堂之南的庭院中西側有鐘樓，東側有經樓，特別是大安寺和興福寺的鐘樓和鼓樓都不是孤立的建築而是用廊子與講堂相接，這種建築形制與我們在西明寺第二次發掘的中殿南伸部分非常相似，所以我們大膽推測，中殿堂的左右南伸部分很可能為鐘樓和經樓，在《關中戒台圖經》中稱之為經臺和鐘台。³¹

²⁹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卷 1 末尾引用宋代孤山智圓重刻《金剛經》序：“古德分經，皆用紙數者，一紙有二十五行，一行十七字”（《大正藏》第 453 號，第 14 冊，第 423 頁）。

³⁰ 張春雷《經臺辨考》（前揭），第 105 頁。

³¹ 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考古發現》（前揭），2000 年，第 343 頁

龔國強的《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也持此看法。³² 可以確認西明寺經臺位於中央大殿右前方，以日本法隆寺藏所藏西明寺圖和大安寺圖相比，則清晰可見（左西明寺，右大安寺，標記處即為經臺位置）³³。



該發現填補了西明藏儲存的缺失，同時也出現新的問題。文獻中還有西明藏存放於院落的記載。前文提及，沙門圓照於貞元年間寫《華嚴經》本收入西明藏時，明確說“菩提院東閣”。圓照離建寺已一百餘年。菩提院自開元五年（717）善無畏在從譯經開始，一直作為譯經場所存在。對於此院的大藏經收藏，下一節中還會詳細談到。

³² 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5頁。

³³ 圖片來源：西明寺圖來源於劉克明《中國建築圖學文化源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6頁。大安寺圖片來源於宿白《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文物》，2009年01期，第27-40頁。

道宣的《關中創立戒壇圖經》表明“院”一般位於佛殿兩側，由廊與院牆圍成，龔國強的考證也說明這一點。³⁴ 因此，除了經臺外，西明寺藏在西明寺的某個院落中也有儲存。追究其原因，方廣錫指出敦煌的龍興寺有上藏、下藏之分：一為官藏，一為日常流通的大藏。³⁵ 因此西明寺存在多個藏經的可能性非常大，以佛教供奉經典的傳統，一部用於供奉，一部用於閱讀是完全可能的。《宋高僧傳》卷十四中記載：“院中置以經藏，嚴以香燈”³⁶，可見有被供奉的藏經。此外，筆者曾以《禪苑清規》為例考察宋代佛教，其中有藏主一職，專伺僧眾閱經一事。³⁷ 此段記載中，經文分類十分詳細貯存在經函內，僧眾取經之時，目的明確。同為禪宗規約的《敕修百丈清規》中有排經櫃圖；³⁸《禪林象器箋》卷二八中注釋說經櫃是因眾寮是看經之所，所以名經櫃。³⁹ 僧人有專門看經的地方。依此而言，則經臺是用於供奉藏經的建築，而非閱經場所。

繁多的藏經由專門的建築存放，房內則以經櫥或經櫃存放。道宣在《廣弘明集》卷一六中說：“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⁴⁰《四分比丘尼鈔》卷三又記有：“供養具，經架、佛床、機案、拂等，及襯香爐、衣香爐、經櫃等。”⁴¹ 經櫃用於閱經，經櫥

³⁴ (唐)道宣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卷1,《大正藏》第1892號,第45冊,第811頁。龔國強《隋唐長安佛寺研究》(前揭),第124頁。

³⁵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135頁。

³⁶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卷14,《大正藏》第2061號,第50冊,第796頁。

³⁷ 湛如《〈禪苑清規〉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08頁。

³⁸ (元)德輝重編《敕修百丈清規》卷7,《大正藏》第2025號,第48冊,第1150頁。

³⁹ (日)無著道忠撰《禪林象器箋》卷28:“忠曰:眾寮是看經之所,故曰經櫃”(《大藏經補編》第103號,第19冊,第765頁)。

⁴⁰ (唐)道宣撰《廣弘明集》卷16,《大正藏》第2103號,第52冊,第210頁。

⁴¹ (唐)道宣撰《四分律比丘尼鈔》卷3,《卍續藏》第724號,第40冊,第771頁。

用於供經。王翔《唐長安西明寺經藏考》一文中，以日本鎌倉時代的“大般若經櫥子”為例，參考河北正定龍興寺的轉輪藏認為是相當大的一件木作。這個結論值得進一步深究。前文提及，寺院內存有多部藏經，轉輪藏等大型木作用於供奉尚可，用於閱讀則非常不便。方廣錫根據《大唐內典錄》復原西明藏的貯存方法：

大立櫥一個，豎向分為左、中、右三大間，每間又分九個橫隔，共成 27 個隔間，其中左邊第六隔層與右邊第二層、第四兩層橫隔又分成二個小隔間。這樣大小總共有 30 個隔間，存放經卷時，大體按照先中間，後左右，先上面後下面的次序按隔間存放。每一帙存放於哪一格中固定不變，每一隔間所放經典的內容均用榜書標示。⁴²

隔間之中，五到十卷為一帙，卷軸的放法是平放在架子上，外側寫有書簽，或者以絲線在軸尾懸牙簽方便查找。⁴³ 這樣一來，便可達到《大唐內典錄》記載“依別入藏，架閣相持。帙、軸、簽、牒標顯名目，須便抽檢，絕於紛亂”⁴⁴ 的要求。該說法符合具體的存放方式，雖無唐代資料說明經書的存放，但是從明清的一些記載中可以反推當時的經櫥樣式。吳承恩的《西遊記》記載玄奘取經之時：“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簽，楷書著經卷名目。”⁴⁵《四庫全書》的藏書方法，以若干部為一櫥，以若干櫥為一號。皆與方廣錫所說相符。

⁴²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 435 頁。另參 Jean Pierre Drège,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1991, p. 214.

⁴³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前揭），第 420–421 頁。

⁴⁴ (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8,《大正藏》第 2149 號,第 55 冊,第 302 頁。

⁴⁵ 吳承恩《西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172 頁。

至此，可以對西明藏的儲存做出大致的結論：西明寺內至少有兩部藏經，一部用於宗教供奉，放置在經臺；一部用於僧人閱讀，放置在經櫥。

4. 女帝家風本尊佛

西明寺藏經後來被稱為“西明藏”，其來源也較為多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由高宗朝皇室御造的一切經之外，我們還可以從碑刻銘文材料之中發現，在此後的不久由其他皇室成員也曾參與西明寺一切經的造經運動之中。這些與武周王室成員相關的經卷曾進入“西明藏”之中，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西明寺橫跨高宗與武周兩朝的皇家大寺地位。據不知名者於 696 年所撰《周故太中大夫司農少卿上柱國太原温府君（思暎）墓誌銘》：

君諱思暎，字藥王，太原祁人也。……先日，奉爲无上孝明皇后寫一切經，擬送順陵。其經今見在西明寺菩提院，可謂盡孝於家，盡忠於國。嗟乎！曦舒易往，趙孟所以愒；陰壑潛移，莊靈言其恒化。即以證聖元年臘月廿一日，薨於西京之萬年縣平康里第，春秋年七十二。惟公禮義廉耻，宣慈惠和。德潤於身，行成於己。自策名委質，官歷九卿。趨馳軒禁，年將二紀。用一心而□□，去三戒□周身。所冀積善有徵，輔仁無爽。悲夫！京兆數萬里，徒欲怨天；滕室三千年，何時見日。即以大周萬歲登封元年歲次景申一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葬於長安之東白鹿原，禮也。

温思暎(624-695)的墓葬，曾於 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 月由西

安市文物考古所在西安市區東郊發掘出來。⁴⁶ 據碑文此人為武周時期的重臣，生前曾被封上柱國、司農少卿、太中大夫。溫思暎卒於武周證聖元年，葬於萬歲登封元年(696)。

在溫思暎生平描述之中，有一個值得重要的細節，即他曾經替“奉為无上孝明皇后寫一切經，擬送順陵。”此處的孝明皇后，即是武則天的生母——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楊氏(579–670)。在高宗朝致拜君親的辯論之中，以道宣為首的京城僧團領袖曾經懇請楊氏來對高宗與武則天施加影響。在此處，則又為她以及武周王朝的奉佛行為，尤其是與西明寺相關的聯繫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與其夫——出身於商人家族的武士護(577–635)不同，楊氏作為武氏家族的重要成員，其出身為高門弘農楊姓；其父楊達(548–612)，早年仕於北周，至隋立之後歷任顯宦。在遠征高句麗軍中去世之後，被迫贈為吏部尚書、始安侯。故至唐興之後，其家門依舊不衰。而且，也繼承了北周以降的家族佛教信仰。再加上武則天11周歲時即喪父，因此其母對其影響就更顯重要。

在高宗統治中後期的顯慶年間，也就是西明寺建立之際，由於武則天的地位日漸提高，年逾八旬的楊氏也在整個朝廷之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也是龍朔二年(662)朝野發生拜俗之爭時道宣等佛教精英求助於楊氏的背景。⁴⁷

⁴⁶ 孫福喜、王自力《西安東郊唐溫綽、溫思暎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2期，第37–50頁。

⁴⁷ 對於道宣以及其他僧界領袖致楊氏的書啟，可參彥棕（活躍於627–662）於龍朔二年(662)編纂的《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和道宣(596–667)於麟德元年(664)年編纂《廣弘明集》兩部文集之中的數通材料，包括：《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大正藏》第2108號，第52冊，第455頁中欄第7行至下欄第

而這份出土碑銘則又提供了楊氏喪葬之後的另外一些細節。據其所載，溫思暎曾經在“无[無]上孝明皇后”去世之後負責“寫一切經”之務，并以之擬送順陵。此處的“順陵”乃是楊氏去世之後的陵寢名稱。在楊氏去世二十年之後的永昌二年(690)，登基之後的武則天對其父母都追封為帝、后，後者的墓葬也改名為“順陵”。通過上述紀錄，我們知道在670年楊氏去世之時，曾有過為之寫一切經來追福的活動，並且準備將之送往順陵。但這些佛經最後並未隨葬，因為這也並不符合佛教的典儀，故最終將這些寫本一切經充入了“西明寺菩提院”。

在此我們繼續討論下一個重要問題，即西明寺一切經的藏經主要地點——菩提院。在此處，我們清楚地看到楊氏追福的一切經被收入此院之中；其原因可能正是因為此院乃是西明寺中的專門藏經與譯經之所。據目前所知，在開元五年(717)之時，印度密教大師善無畏(Śubhakarasiṃha, 637–735)在攜帶大量梵本進入長安之後，先居住在興福寺南院，至是年玄宗下令他居住在西明寺，並於菩提院中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⁴⁸此時距離武則天母親去世時(670頃)，人們將新造的一切經收藏於此院中約有半世紀。而在此後一百多年，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份材料中得知西明寺菩提院中依然是儲存一切經的地點。在貞元十四年(798)，西明寺僧圓照就“書寫此新

11行)；《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啟一首》(《大正藏》第2108號，第52冊，第456頁上欄第5行至中欄第1行)；《大正藏》第2103號，第52冊，第284頁上欄第28行至下欄第3行)；《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啟一首》(《大正藏》第2108號，第52冊，第473頁上欄第24行至中欄第7行)等。

⁴⁸ 《開元釋教錄》卷9，《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572頁。

譯經（指《華嚴經》），填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本。”⁴⁹ 故而，雖然我們沒有在西明寺創建之初的七世紀中葉，此寺所獲得最早的皇室御造藏經在西明寺中所藏的具體地點，但就這些材料的梳理來看，西明寺藏經最可能的收藏地確實就是菩提院，它不但是收藏佛教經典集成之所，也是新譯經典的譯經僧逗留之地。

回過頭來看這份碑刻銘文，大致可以梳理出線索如下：在龍朔二年（662），也即楊氏八十四歲高齡之時發生了著名的拜俗之爭。至少在楊氏以及其他朝廷中信佛之士的協力之下，這次佛教面臨的重要關口得以安然度過。我們從其他材料中可以發現，西明寺以及整個帝國僧團的領袖——道宣律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僅僅在八年之後，楊氏去世，為其追福的寫本一切經也被充入了西明寺的藏經之中。這也為我們了解西明寺的藏經來源，至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並且，這條材料也展示了此寺與武氏家族、武周政權之間另外一重不太為人所知的緊密關係，並且為我們理解唐代寫本一切經的產生、功用以及與政治之間的緊密紐帶提供了幫助。

5. 西來東去法水流

西明藏的所存數量之多，儲存結構之精密，來源之複雜，已經逐步釐清，它的傳播也不容小覷，傳播路徑有向東與向西兩條。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是從西明寺的弘法高僧，二是流傳的典籍。

西明寺作為一個佛教文化中心，吸引了眾多高僧前來學習，他們

⁴⁹（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藏》第293號，第10冊，第849頁。

學成之後的弘法路線可分為東西兩路。

向東一路，人數眾多。以《全唐文》為例，其中卷二五七《唐河南龍門天竺寺碑》記載，寶思維法師曾在西明寺有譯經，後前往河南龍門建立天竺寺；卷五八七《龍安海禪師碑》中提及海禪師曾在西明寺學法，後遷至龍安寺；卷六二一《沙門般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有般刺若在西明寺翻譯《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之事；卷七三一《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則說繼承大悲禪師衣鉢的祇有西明寺全證禪師；卷九一三《白鶴寺記》說惟謙、繼南二位法師在西明寺，被命內殿講新譯《仁王》等經。⁵⁰ 眾多高僧曾經在西明寺或譯經，為西明藏增加新內容，或學習，將西明藏的內容帶往全國。此外，還有眾多的日韓僧人，如空海、圓測等人，到西明寺學習，將西明寺的學風向世界傳播。

向西一路，代表人物則是在敦煌的曇曠、乘恩。他們二人因戰亂避入敦煌，在敦煌傳播唯識學。曇曠在《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中自序“切俱舍唯識”，他曾撰有《大乘入道次第開決》等多種唯識學著述。而乘恩則曾在敦煌沙洲擔任過重要的僧職——“都教授”。 “[曇曠與乘恩] 他們一起代表了八世紀末在沙洲興起的來自長安西明寺的唯識學潮流。”⁵¹ 自此之後唯識系僧人層出不窮，如法成、洪辯、法榮等，大量的唯識著作在敦煌出現。

雖然西明藏的傳播離不開人，典籍的流傳也不可或缺。以下從對正藏和雜藏的傳抄進行分析。一部藏經造好之後，首先要做的是傳

⁵⁰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257，第2601頁；卷587，第5937頁；卷621，第6269頁；卷731，第7547頁；卷913，第9310頁。

⁵¹ 姜伯勤《敦煌本乘恩貼考證》，收入氏著《敦煌的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87頁。

抄天下。善無畏翻譯的經典入藏之後，代宗下令：“所翻經典，皆洞精微，受命施行，式傳惠照，寰示頒寓。”⁵² 西明藏做為皇家修藏，自然也有這樣的待遇。因此正藏的傳播可以確認無誤。

經本傳抄大體相似，西明寺最具史料價值的雜藏是否也傳抄出去？向東一路，有日韓的求法目錄可以經對照。向西一路，S.4640 號寫卷《沙洲乞經狀》顯示敦煌曾經獲得御賜大藏經，雖不明瞭所賜是何藏，卻反映出當時敦煌的藏經不少。對於西明藏的具體流傳，難以確切考證，祇能以西明藏曾經出現過的典籍進行考察。

《開元釋教錄》所收的賢聖傳有中土撰述著作 40 部，《貞元釋教錄》增加 4 部 52 卷。《慧琳音義》在西明寺編撰完成，所依據的典籍應是西明寺藏書，因此取三部目錄中相同部分，為西明寺雜藏的可能性最大。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智證大師請來目錄》（簡稱智證目錄）、《東域傳燈目錄》（簡稱永超目錄）、《御請來目錄》（簡稱空海目錄）、《注進法相宗章疏》（簡稱藏俊目錄）、《律宗章疏》《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簡稱高麗別錄）進行粗略比較，顯示雜藏流通情況，列茲如下（祇考察存在與否，不考察出現次數）：

	文獻名稱	敦煌寫本	日本	高麗
1.	《釋迦譜》十卷			
2.	《弘明集》十四卷			
3.	《釋迦氏略譜》一卷			
4.	《釋迦方志》二卷			

⁵² （唐）不空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 3，《大正藏》第 2120 號，第 52 冊，第 840 頁。

5.	《大唐內典錄》十卷	P.3807		
6.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智證目錄 ⁵³	高麗別錄 ⁵⁴
7.	《東夏三寶感通錄》三卷		智證目錄	高麗別錄
8.	《續高僧傳》三十卷		永超目錄 ⁵⁵	
9.	《廣弘明集》三十卷			
10.	《經律異相》五十卷	北 8696		
11.	《比丘尼傳》四卷		永超目錄	
12.	《開皇三寶錄》十五卷		智證目錄	
13.	《眾經目錄》五卷			高麗別錄
14.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			
15.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永超目錄	
16.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P.2840		
17.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18.	《古今譯經圖紀》四卷		空海目錄 ⁵⁶	
19.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十五卷			
20.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P.3814	藏俊目錄 ⁵⁷	

⁵³ (日)圓珍撰《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第2173號，第55冊。

⁵⁴ (高麗)守其等校《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高麗藏》第1402號，第38冊。

⁵⁵ (日)永超撰《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第2183號，第55冊。

⁵⁶ (日)空海撰《御請來目錄》，《大正藏》第2161號，第55冊。

⁵⁷ (日)藏俊撰《注進法相宗章疏》，《大正藏》第2161號，第55冊。

21.	《集沙門不拜俗儀》六卷		永超目錄	
22.	《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藏俊目錄	
23.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		永超目錄	
24.	《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律宗章疏 ⁵⁸	
25.	《別說罪要行法》一卷		永超目錄	
26.	《受用三水要法》一卷		永超目錄	
27.	《護命放生儀軌》一卷		永超目錄	
28.	《法顯傳》一卷			高麗別錄
29.	《梁高僧傳》十四卷	S.3074	永超目錄	
30.	《辯正論》八卷	P.3766		高麗別錄
31.	《破邪論》二卷	P.3617		
32.	《甄正論》三卷			
33.	《十門辯惑論》二卷			

以上所列書卷，日本對中國的眾多著述都有求取，敦煌和高麗則較少，據此，敦煌和高麗側重義理部分，對僧史和經集類的傳播並不大。

⁵⁸ (日) 榮穩撰《律宗章疏》，《大正藏》第 2182 號，第 55 冊。

6. 小結

西明藏編修之時，對中土著述的僧史、經集進行收錄，此前雖有人進行過此項工作，但是因後繼無人不能發展，西明寺高僧雲集，將西明藏的編修方式傳往各地。至玄宗時期朝廷正式將中土著述入藏，宋朝起始對禪宗的語錄也加以收錄，西明藏為後世藏經收錄體系的里程碑。

西明藏的儲存，則是有兩大類，一是用於供奉的藏經，應放置在經臺中，一是用於僧眾閱讀的藏經，此類藏經的存放，以方便實用為主。通過碑銘材料，還可以發現西明寺的藏經來源之一為武則天為母親祈福時書寫的一切經，這就為武周一朝及武氏家族與西明寺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另外一重證據，也可以使人更加瞭解唐代皇家大寺特殊的政治地位。西明寺豐富的藏書吸引眾多高僧，僧人又將西明學風帶往他方，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西明藏中別藏的內容，經對比眾多日、韓、敦煌文獻，發現僧史、經集傳播力度不大，但是唯識部分流布八方。